

——·写了11年，心血力作·——

杀兄屠弟的李世民，为何成为后世颂扬的千古一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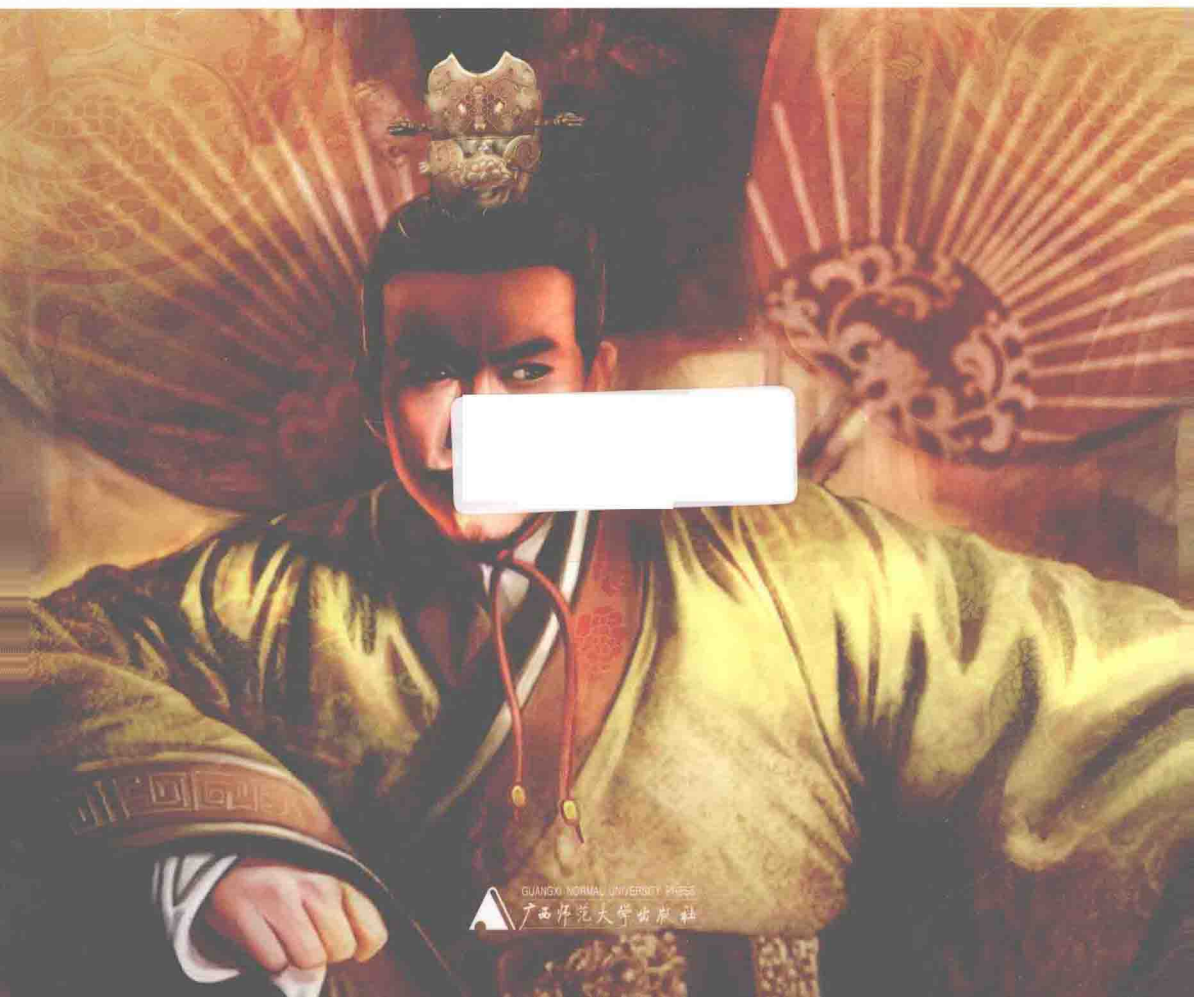
贞观之治·守业（深度调查） 汤浩方 著

李世民的奋斗

国内首部全景式讲述千古一帝李世民创业、夺权与奋斗的传奇一生
1363年来，最真实、最好看、史料最全的李世民全传



悬疑·惊险·刺激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LISHIMIN DE FENDOU

贞观之治·守业（深度调查） 汤浩方 著

李世民的奋斗

国内首部全景式讲述千古一帝李世民创业、夺权与奋斗的传奇一生
1363年来，最真实、最好看、史料最全的李世民全传



此情可待成追忆——汤浩方帝王系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世民的奋斗. 下 / 汤浩方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95-5953-4

I. ①李… II. ①汤… III. ①李世民 (599~649) — 传记 IV. ①K82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117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20 mm × 970 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8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一·远古的游历

王 斌

王斌，著名作家、剧作家和资深文学评论家，张艺谋文学策划与电影编剧。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90年代转入电影策划与编剧，策划和编剧过的电影有：《活着》《英雄》《霍元甲》《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漂亮妈妈》《菊豆》《我的父亲母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青春爱人事件》《美人依旧》等。出版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活着·张艺谋》，长篇小说《遇》《味道》《六六年》等，另有大量小说、文学评论及散文发表。



汤浩方与我，结识于网络，我们共同迷恋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这样一个神奇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相识，似乎也有了“奇异”的可能——或许无需太多的语言、太多近距离的接触，在虚拟空间中留存的文字，就足以让相知却不相识的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与汤浩方便为典型一例。

汤浩方隶属“80后”，如今这一称谓，也成了一个颇为时尚且时髦的名词了，它的后缀还要引申出诸如任性、骄狂、自私、沉迷于网络且追逐流行及时尚的诸般解说。而在这一切的解说中，却暗含着对这一代“沉沦”的叹息。



我亦属“叹息”一族。

所以汤浩方的出现让我惊诧，他告诉我说，写了近百万字的历史小说，并且正在写历史，希望我能为此写篇序。接着，他的部分文稿也随之出现了，我留心地看了一遍，一时无语。

坦率地说，在汤浩方驾轻就熟的历史知识面前，我自愧弗如。他告诉我，少年时就迷上了历史，他像一位好奇且又执拗的“探险者”，一头扎进了历史的汪洋之海中，开始了漫长的游历。

而我的少年，却在狂热地“挥霍”着“读书无用论”，我们逃学、打架、戏弄老师、嘲讽长者，以学习为耻。历史在那时的我看来了无生趣，我鄙夷且不屑一顾。在残酷的青春岁月中，我们虚度光阴，于今想来，悔之晚矣！

而汤浩方的少年，却悠游自在地与历史为伴，他在其中发现了乐趣，也发现了自我的志向所在。终于在今天，他要启动他所执掌的历史巨轮，起航了。

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在沉重的历史迷雾中一直在追寻着民族的大义。这一被冠之于“春秋大义”的精神，于今几经沉沦后，终于在萌动中苏醒了。可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喧嚣，众家各显神通地挥舞着个性的大旗摇唇鼓舌，并以“卫道士”角色自喜。我高山仰止，自惭形秽，因历史于我是一片空濛的崇山峻岭，虽心向往之，然毕竟才疏学浅，即便窃自潜心研读，试图跟进时代的步履，可还是徒叹奈何。少年的轻狂，让我耽误了大好时光，只能怆然自叹了。

所以我对汤浩方示以敬意，他的文字亦如“80后”之风格，轻盈、率性、不拘一格、随意挥洒，而且俏皮风趣，极具才情。

在这一代人的眼中，历史失却了它故有的那份沉重和苍凉，失却了岁月的凌厉和悲壮，仅仅是一个好玩的故事，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

于是他潇洒自如地轻松道来，看着有趣，让人心生快意。

读汤浩方的文字及故事，无疑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不经意间，信手拈来，轻松而不刻意，宛如茶余饭后可口的小甜点，一路读来亦有收获。这收获是对历史事件及人物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起码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在那样的一个冷兵器时代，或者说是铁血年代，我们中华民族诞生了许多伟大而有趣的传奇人物，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缘由和欲望，毕竟无意中

缔造了中国历史，缔造了中华记忆，成为我们后来者的集体无意识。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再度被发掘与发现，说明了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之后开始走向真正的成熟和觉醒，开始在历史的千年流变中，重新找寻我们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个性和位置。

我们的确迷失太久了，太多纷纷扰扰的“西式”思想及做派让我们无所适从，让我们盲目地亦步亦趋。我们忘记了一个民族要真正获得世界的尊重，恰恰不是因为“大同”式的共性，而是自强且自信的民族个性。

汤浩方目前似乎更多的是在发掘历史的故事，他那“80后”典型的游戏心态驱使他要将历史“还原”于一个充满“喜剧感”的叙事。因为是隔岸观火，因为年轻，让他一时还难以梳理出隐藏在这貌似“游戏”的历史背后的分量和气韵，以及随处可能散出的中华精神。但他毕竟已然“生活”在了历史中，这就足以让我惊叹了！

我们还不能要求他做到把历史作为反观今天的一面镜子，他太年轻了。终究有一天，他也会带着他散发着风尘的经历重新走进历史。那时，或许他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因为历史的发现，是需要岁月磨砺的。

2007年5月25日于北京

序二·真实是上帝的事业

徐 刚

徐刚，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语言文字、经学和思想史，著有《古文源流考》《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等。



其实我们都知道，真相未必是美丽的，甚至可能是丑陋的、残酷的，让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可是在现代汉语中，“真善美”常常并称，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勇于追求真相的美德。我经常反躬自问，得出的结论是，我勇于揭示历史的真相，却怯于说出自己周围的真实，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研究历史的人。这反思的自惭也让我更加佩服鲁迅先生，他解剖自己的刀，下得太不留情了。

有一句老掉牙的话说，真理是赤裸裸的。我理解这句话的真意，不是说真理本身是赤裸裸的，而是我们面临事关自己的真相时，总是发现自己是赤裸裸的，任何遮羞布都是欲盖弥彰。

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坦率地赤裸相对？基督教的《圣经》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最初在上帝面前，就是赤裸裸的，后来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果，才认为赤裸是羞耻的，开始用布遮掩自己。这多少具有某种寓

言的性质，我们本来可以直面真相，却因为自以为有智慧，总想把自己真实的部分遮盖起来，所以我们学会了说谎。

生于今之世，要我们像老子那样，“绝圣去智”，回到无知无欲的社会形态，当然是幻想。因为人类似乎有足够的理由骄傲，我们已经创造了多么灿烂的文明，而这都是拜智慧之所赐。不过，智慧毕竟是说谎的前提，我很想请教一下动物学家们，动物们是不是也会撒谎？不过，即便它们也撒谎，想来也绝不可能像我们人类这样，撒那么多谎，而且能撒得那么大，撒得那么精致，那么理所当然。

有了第一个谎言，就会有第二个，谎言需要另一个谎言来掩饰。再精致的谎言，其实也经不住执着的追问。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去打破沙锅问到底，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追求真相，很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历史充满了谎言。

准确地说，是书写下来的历史，充满了谎言，因为历史，是人在书写。历史学也充满了谎言，因为历史学，也是人在研究。所以，很多近代以来的史学，对传统史学求真的基本原则提出挑战，认为真实的历史不存在，任何历史都受到说历史的人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知识的局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这样的历史观有其发人深省的积极之处，那就是提醒我们：警惕某些人蓄意告诉我们的“历史”，警惕那些以真理的名义述说的“历史”，警惕那些自以为自己的言行就是“历史”的人，不可以不加分析地信以为真。然而，它的消极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给那些恣意篡改历史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依据，那些拥有话语权的害群之马更加肆无忌惮地腐蚀了我们的思想，也摧毁了我们的诚信。

所以，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还是主张要回到真相上来，回到上帝那里去——实在是上帝的事业。人的智巧总有缺陷，在用谎言掩盖谎言的过程中，难免留下破绽。历史学家就是知识的侦探，就是要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找寻真相。我与那位传说中小侦探的信念相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我们也许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会充分估计到犯错误的可能性，直面自己的错误，勇敢地逼近真实，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我们不必问真相是否美丽，按照真



实的情况去说去做，永远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有追求真实，个人的生命才不至于荒谬，伟大的理想才不至于空虚，人类的灵魂才得以据守最后一片安宁的阵地。真实的力量也许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不相信丑陋的事实没有价值。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论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总是拿着我们普通人的灵魂去拷问，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我把这话作为我的座右铭。

古人已逝，但往事并不成空。研究历史的人，在一定意义上，是要为古人主持公道的，尤其是为那些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话语权力的弱者。这是因为历史学家首先要面对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如果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不必去研究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在时光隧道中穿梭；寻找历史的真相，充满挑战与艰辛，然而又无可逃避。一个认真的历史学家，恐怕先要把自己的灵魂放在十字架上，拷问自己是否有勇气赤裸地面对上帝。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知道汤浩方君，是在2011年的年初，那时，他的三国将要出版，写信给我，要求为他的书作序。我一度因为素不相识而想拒绝，但是他的那些谈理想的火热话语深深打动了我。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相逢何必曾相识？所以我为他的书写了一篇《三国颂》。今年夏天，他忽然又来信，告知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并再次要求我为他的“历史真相系列”作一篇序。在追求理想的路上，我常感寂寞，我也希望找到更多的同路人。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点浅薄的见解，说给他，也说给他的读者听。

徐刚

2012年9月15日夜
写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贞观之治·守业

目 录

第 一 章	个性人生 ·····	1
第 二 章	灭高昌 ·····	19
第 三 章	魏征 ·····	54
第 四 章	太子谋反 ·····	82
第 五 章	征高句丽(上) ·····	124
第 六 章	征高句丽(下) ·····	150
第 七 章	四大冤案 ·····	176
第 八 章	击灭薛延陀 ·····	196
第 九 章	西域大战 ·····	221
第 十 章	巨星陨落 ·····	249

第一章 个性人生



凄风苦雨中，你可否知道，在那遥远的塞外，还有一双孤独的眼睛正在眺望自己的家乡？

这时候，风也在呜咽，草也在哭泣。



《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唐朝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李世民修订《氏族志》。不就修一本书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要小看这本书，那可是小中见大的重量级大事，因为唐朝的统治阶层本来是以关陇贵族为主，加上山东、江南士族以及部分庶族豪强，正是在这些“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唐朝才得以迅速建立。为了中央集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李世民除了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有所作为，还十分注重协调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氏族志》的修订，便被视为其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氏族，就是士族，而在唐初有“权威认证”的士族，都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士族，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



他们的“光辉历程”。

士族在东汉时期开始崛起，源于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发展到后来，要想做官，都要先看你的门第出身，只要有士族的牌牌在手，绝对优先考虑。魏晋时期，政治上出现九品中正制，更让士族特权完全制度化，成为所谓的门阀，门阀以外的称为庶族。两者不但政治地位悬殊，社会地位也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不能通婚，连生活习俗都有严格限制。

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战乱，士族遭受很大打击，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士族的品牌价值依然不容小觑。唐初时期，他们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贵族，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连李唐皇室在这方面都要稍逊一筹。正是拥有这些资本，山东士族便以自己门第高贵而高高在上，甚至在通婚这个问题上，都不把皇室放在眼里。李渊早就对此耿耿于怀，公开批评他们妄自尊大；而李世民更是对他们借其他家族想“攀高枝”的心理而敲一笔聘礼的卖婚行为非常不满，指责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为了提高李唐新贵们的社会地位，巩固政权，李世民下令进行士族大普查，统一全国谱牒，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事？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一、刊正姓氏，对全国的士族身份进行重新认定。

二、考其真伪，打击冒充士族的“假冒产品”。这是一个细致活，要进行严格的“审计”和考证，其主要方法就是“质诸史籍”，就是说找历史根据，追查先世身份。

三、褒忠贬奸。其实就是对拥护李唐王朝的进行褒奖，而反对的便打击了。这是基于维护政权的现实利益考量，因为在古代，宣扬忠君思想才能更好地维护其统治——支持我就是忠，反对的自然就是奸了。

由此可见，李世民修订《氏族志》，其最终目的就是重新确立封建等级，构建一个忠于李唐王朝稳固的统治集团，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在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时，他就下令以吏部尚书高士廉为首，联合御史大夫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音fen）、中书侍郎岑文本负责这项工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氏族志》终于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完成初稿，进呈御前。

李世民看后，却大为不满，要求重修。

原来这个《氏族志》不符合他的心意。高士廉等人虽然对全国各地的族姓和谱牒非常熟悉，但门阀观念依然很重，依照传统按郡望高低定等级，将崔民干列为第一等，这就是所谓的“尚姓原则”。而李世民呢，他要求“尚官原则”，即不管以前的规矩，另起炉灶，以今日的官爵高下作为新标准，其目的就是“欲崇重今朝冠冕”，意思很明白，重新确立当朝高层人士的社会地位。

其实当初李世民有过暗示，只是没有明说，无奈高士廉领悟力不高，搞出这么一个本本，也怪不得李世民要质问为什么仍把崔氏放在第一等了。道理很简单，我这个皇帝往哪里放？本来叫你们重修，就是要制定新规则，最后却弄出这么个玩意来糊弄人，那就只有重来了。

没办法，高士廉他们只好“回炉重炼”。



世俗的力量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终于在两者之间达成了一个新的平衡，当然李世民亦有让步，最后的“成品”，就是以皇族李家为第一等，外戚次之，而崔氏拿了块“铜牌”，降为第三等。其实这也是有照顾的，因为按道理讲，列为第三等的应该是宰相公卿贵族，但李世民也要兼顾各方利益，可以说，这是尚官与尚姓之间达成的折中方案。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春，《氏族志》正式颁行天下。姓分九等，共100卷，收录293姓、1651家。《氏族志》也被皇家收藏为永久性档案。

《氏族志》的出台，打破了以往单纯以郡望作为当官条件的传统，也符合当时新旧贵族新陈代谢的历史趋势，同时也取消了仅仅依靠大族门阀便自动获得政治、经济特权的旧制。要想拥有这些，就去参加科举吧！

李世民修订《氏族志》，是为了抬高当朝特权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人说主要是抑制和打击山东士族，我看未必，其实他的本意是为了改变山东士族“卖婚”这种陋习，因为卖婚搅乱社会秩序，败坏风气，甚至被李世



民认为既无礼、又无耻。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有所表示了。

可是李世民这种寄希望于行政手段禁止卖婚的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甚至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又特意下诏，说“自今年六月禁卖婚”，可是形同一纸空文，因为世俗的力量是巨大的，几百年形成的传统，岂是强制手段可以消灭得了？在人们的意识里，山东士族，始终是高贵的贵族，与他们结亲家那是三生有幸，不但脸上有光，还是在别人面前显摆的资本。终唐一代，山东士族始终是“香饽饽”，比方清河崔家，光宰相就出了二十三个，想与他们攀亲戚的朝中大臣，更是如过江之鲫，经常挤爆门，可见山东士族这块金字招牌，始终没有因为修《氏族志》而黯然褪色，反而越擦越亮。

这或许是李世民的悲哀，想改变，却无力改变。

很多事情，只能顺势而为，强行去改变人们的传统习惯，往往费力不讨好，甚至适得其反。

在《氏族志》公布四个多月后，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大臣，又有一个离开了他，不是出差，而是去世了。

这个人，就是虞世南。

以前说过，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去世的前后几年，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都慢慢地在李世民面前消失，与他生死相隔。无论是多么强大的人，都难敌自然规律，衰老和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甚至可以说，死亡，才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

张公谨、李元亨、李器、周范、温彦博、虞世南、王珪、宇文士及，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死了。这里，我们重点讲三个人，看看他们的一生，是怎样的传奇。

看别人的人生，其实就是看自己的人生。

我要讲的这三个人，一个是温彦博，一个是虞世南，一个是王珪。这三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文官，且极具个性。

先说温彦博。温彦博是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夏天去世的，他是宰相，为右仆射，长期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可以说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令李世民十分感动，也很内疚。他不无遗憾地对身边大

臣说：彦博忧国忧民，耗尽心力，我两年前就开始发现他劳累过度、体力不支，竟然就这样没了，后悔没让他享享清福啊！

对于温彦博，李世民只有愧疚与遗憾。



温彦博

温彦博，字大临，太原祁县人。他有三兄弟，以文学著称，与同时代颜之推被称为“颜氏三雄”的三个儿子颜思鲁、颜愨（音 mǐn）楚、颜游秦齐名，被誉为“温氏三雄”。

兄弟仨数温彦博的经历最为奇特，温彦博从小就很聪明，口才一流，悟性好。隋朝大文豪薛道衡和社会名流李纲看到他们三兄弟，都不约而同地赞叹道：“三人都是卿相之才啊！”开皇末年，他被人推荐做了一个从九品的文林郎，并在内史省就职，大业年间任通直谒者（相当于中书舍人），后来成为幽州总管罗艺的司马。

身在长安，在中央工作的温彦博，怎么会跑到幽州去做“秘书长”呢？

原来在杨广二征高句丽时，杨玄感起兵叛乱，斛斯政奔逃高句丽，在这危急时刻，温彦博临危受命，出使高句丽，成功完成任务后调任东北道招慰大使。就在这个时候，罗艺看上他了，将他招为司马。罗艺降唐，他出力不少，封西河郡公，授予幽州总管府长史，为幕僚之首。后来李渊见他是个人才，便征他入朝，拜为中书舍人，不久迁中书侍郎。

想来可以生活无忧了，可是不久突厥入寇，打碎了温彦博的优越生活。他干起了老本行，担任并州道行军长史，不想在太谷之战时，行军总管张瑾战败，全军覆没，“张司令”逃到李靖那儿避难去了，而他就没那么幸福，被突厥逮了个正着。

颉利可汗知道他是李渊的近臣，通过他肯定能捞不少情报，于是屡屡逼问其国内虚实及兵马部署。温彦博心中只想着自己心爱的祖国，坦然而



无所畏惧，绝不当叛徒，打死都不说。颉利大怒，把他关起来，押到阴山苦寒之地，开始了地狱般的艰苦生活。

这一刻，他或许想起了汉朝“使于四方，不辱使命”的苏武，感受到了孤独的滋味。朔风凛冽，他凝视一望无际的草原，有些落寞，但忠贞不渝的信念，让他始终坚持。

凄风苦雨中，你可否知道，在那遥远的塞外，还有一双孤独的眼睛正在眺望自己的家乡？

这时候，风也在呜咽，草也在哭泣。

终于等到李世民即位了，颉利可汗为了表示点自己的心意，将他放了回来。他再次踏上自己的祖国，一回到长安，就被任命为检校吏部侍郎。可是他不大适合做人事工作，一上台就大规模进行人事调整，许多不符合他要求的人都被免职，这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嚣讼盈庭”——这些下岗人士都来找他理论，他也仗着好口才与他们辩论，成天吵吵闹闹，不得安宁。

这样人为制造噪音，引起许多“正义人士”的不满，有人开始攻击他。李世民没办法，只好调他干起了原先的工作：中书侍郎。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成为中书令，封虞国公，官至宰相。自从掌握国家机务以来，他就谢绝宾客，与他们断绝来往，免得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同时也不给这些人创造扔“糖衣炮弹”的机会。但凡是国家大事，他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李世民十分欣赏，多次予以褒奖。

其后，朝廷击败颉利可汗，在讨论如何安置突厥人时，他又发挥出色的口才，与魏征进行异常激烈的辩论大赛，许久都难分胜负，最后魏征不是他对手，李世民听了他的。正因为温彦博口才好，而且声音好听，还能“唱高音”，所以有时候就选他来宣读圣旨，其表现也是超级棒，他的“男高音美声”经常响彻殿庭，加之形象也不是一般的好，以至于粉丝一大堆。

李渊有一次请朝臣吃大餐，一时性起，命秦王李世民宣旨，让他体验一下宣读圣旨的乐趣。李世民读完后，李渊问左右：“和温彦博比怎么样？”拿李世民和他做比较，可见在皇帝心中，他的位置何等重要。



温氏三雄

到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时，温彦博担任尚书右仆射，可仅仅过了一年，死神就光顾他了。他死后，家里居然连个堂屋都没有，棺材只能停放在别室，李世民看着都难过，忙叫有关部门在他家建了一个堂屋，可是他，再也享受不到大房子的宽敞了。

堂堂一国宰相，自己的住房居然都不达标，说起来都丢人。可就是这些“丢人”的人，从未给自己谋过私利，他们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了百姓，他们宁愿舍弃自己的幸福生活，这可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行动中。纵观贞观一朝，这样的官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主要原因有两个：社会风气，以及责任心。当然还有李世民良好的制度设计。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吗？

温彦博另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哥哥温大雅，一个是弟弟温大有。

温大雅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玄武门之变前被李世民派往洛阳待变，只可惜死得太早，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不久就去了，而在这之前还有一件逸事。

当时温大雅想改葬爷爷的坟，找了块宝地后，风水先生说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怎么办？他不以为然，说只要弟弟他们好，我就可以含笑九泉了，不想就过了一年多，他真的死了——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温彦博的弟弟温大有，就是晋阳起兵后打第一仗进攻西河时，李世民、李建成兄弟俩的高级参谋。他死得更早，武德初年就去世了。

这三兄弟不愧是“温氏三雄”。当年隋朝时，温大雅与颜思鲁在东宫，温彦博与颜愨楚在内史省，温大有与颜游秦在秘阁（皇家图书馆）。两家兄弟为一时青年才俊，备受推崇，不过“颜氏三雄”学业更胜一筹。可时过境迁，到了唐朝，“温氏三雄”又占上风，当的官都比颜氏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就是这样充满传奇。